

最平凡的港大院士

她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却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们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袁苏妹从没想到,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她被安排压轴出场。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这位老头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学历,没读过小学,除了自己的姓名,她当时还不大会写其他字;工作经历,从29岁到73岁,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

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直到此时,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颁发院士的荣誉,是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们的生命”。

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走路很慢,弓着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然而在港大人眼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高大”得近乎“一个传奇”。

有人开始称她为“我们的院士”,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三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抱怨男孩子“只顾读书,对她不够好”。多数时候,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珍惜眼前人”,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将不开心的事忘掉”,等等。每年毕业时节,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尽管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

尽管竭尽全力工作,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

眼下,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

“这个是大律师,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眼科医生。”翻开相册,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她甚至记得一只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对方曾邀请她一起“打太极拳”,她“怪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这位从没摸过教材的老人,压根儿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堂“迎新教材”的一部分。在名为“宿舍历史”的课程中,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

舍之歌:“大学堂有三宝,旋转铜梯、四不像雕塑和三嫂。”

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一天,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邀请其“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大学院士衔”。“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这位提名者说。事实证明,三嫂的提名“全票通过”。

3个月后,“不知道院士是什么”的袁苏妹前去参加典礼,坐在面对600多人的台上,她一直试图记住前面的人“走哪条路、何时戴帽、怎样行礼”,生怕“忘记了整个程序”。

她坦承,直到走上台前,“袍子后面的腿一直在抖”。直到听到周伟立提到她曾经因为避难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时,她感到一阵“辛酸”,最后“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副校监的颁授。

当时,观众中20多名“头发都白了”的旧生,兴奋地跳起来鼓掌喝彩,典礼负责人甚至不得不让工作人员走过去,请这些政商两界的知名校友“不要太激动,保持安静”。

次日,旧生们振臂簇拥中的三嫂被《苹果日报》头版以整版报道。此后,她登上了美食节目介绍自己拿手甜品“马豆糕”的做法,在娱乐节目“东张西望”中被专访,香港各大报章几乎都能找到三嫂的照片。

大学堂旧生会为庆祝她荣获荣誉院士衔,特意在饭店里摆了30桌酒席,300多个旧生到场祝贺。而她能回赠的,只是一张自制的、只有手掌般大小的卡片。由她口述,女儿打印的祝福文字,每一字都再普通不过:“读书口既,学业进步!”“做工口既,步步高升!”“做生意口既,生意兴隆!”“搵车、坐车口既,出入平安。”

只是,这个本来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院士”,足足用了两天时间又学写了两个新字。她一笔一画,签了300多张感谢卡——“三嫂”。

摘自《中国青年报》

施恩的最高境界

入冬时,陈太太带着孩子去纽约与先生团聚,并把孩子送进了一所公立学校念书。纽约的冬天是冷极了,暴风雪几乎是家常便饭。有时几尺厚的积雪使得部分公司和商家不得不暂时歇业,可是公立学校却照常依旧开课。接送小学生的公车艰难地爬行在风雪路上,按时将孩子们接送来往。

陈太太像许多家长一样,对校方的这些做法很不理解:有必要非得在这样的恶劣的天气里让孩子们去上学吗?她忍不住打电话给学校,打算向校方提出停课的建议。待陈太太说明原委后,校方的答复却令她感动良久:“正如你所知,纽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不少穷人家庭冬天甚至用不起暖气,

把那些孩子接到学校来上学,他们不仅能拥有一整天的温暖,还能在学校里享受到免费的营养午餐!”

感动之余,陈太太灵机一动,自认为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她又打了一个电话:“为什么不在有暴风雪时,让家庭好的孩子们待在温暖的家里,只接送那些贫穷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呢?”

这一次,校方的回答不仅令陈太太热泪盈眶,而且终生难忘。校方回答说:“施恩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保持他人的尊严。我们不能在帮助那些贫穷孩子的同时,践踏他们的尊严。”

摘自《商界》

为了听觉的尊严

2007年初春,日本千叶县新一届市政为了改造旧城市容,决定将原来的老树全部更换。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决定向市民公布后,立即遭到一个叫松川的人的反对。

反对者松川是一个老人。他在向市政递交的抗议书中说。本地现在生活着几千只鸟儿,比如画眉、八哥、蓝靛颏、斑鸠。这些鸟类在冬天都是依靠现在的绿化树上结的果实为食越冬。如果换掉现在这些树木,将会让生活在这个地区成千上万的鸟儿因为饥饿而死亡,或者迁徙。如果没有了鸟儿,这个地方的人们将再也听不到它们婉转的叫声了。

为了慎重起见,市政决定专门为此事召开一个听证会。那天,会场来了许多人。

当市政代表陈述了他们的造福市民的初衷后,松川老人反驳说,如果市政真是在为市民着想,就应该尊

重市民们的需求。

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发达,车多了,音乐广场多了,商店多了。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被迫听这些可恶的噪音。天籁的美妙早已挤得所剩无几。没有了虫子的叫声、蛴蛴和蚂蚱掠过草尖的扑扑声,没有了河水潺潺,甚至也没有了公鸡打鸣和母鸡咯咯。我们只有每天清晨和黄昏聆听这些鸟儿的叫声这唯一的听觉享受了。如果换了树种,就意味着我们听觉的最起码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

许多观众最初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其实只是抱着看热闹的态度来的。可是,当他们听完松川老人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后,不由得发出热烈的掌声。

市政代表中有人说:“难道说四季都有鲜花欣赏的享受还弥补不了听不到鸟鸣这个小小的缺憾吗?”

松川回答说:“难道您不认为美

丽灵动的鸟儿本身就是一朵朵活着的花朵吗?”观众们再次鼓掌。

会场安静了片刻,市政代表向老人抛出了一个难题:“您说得十分在理,但我们已经和新加坡方面签订了合同,如果我们单方面提出变更,我们将会承担一笔巨额的违约金啊!”

所有支持松川老人的观众都呆住了。他们不知道松川的努力是否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在大家的注视中,一直站着的松川掷地有声地说道:“如果您们愿意改变计划,我愿意为市政筹集违约金。我个人力量有限,可是,我会调动我的亲戚朋友,我的邻居……”他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一下子站起了许多观众,他们都在说同样的话:“还有我,我的亲戚、朋友!”最后,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们都愿意为这个固执的老人做坚强后盾,因为他们现在都清楚了,他是在尽力保护他们生活的最后一丝丝诗意和韵味。

亲爱的读者,诚如你的所料,当然还有你的所愿,迫于市民的压力,千叶县市政最终还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摘自《视野》

法国流行老市长

88岁……

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能当市长?这就是由法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法国,市长有两种当法。一种是实干型,要抓经济、搞建设、抓治安。而另一种是名誉型的,虽在其位却不谋其政,那些促经济、搞建设的事情都放手交给手下的助理(顾问)去做了。

工作都交给助理(顾问)了,市长岂不是什么都不用干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名誉型的市长也还

如果你问一个法国人:“一个人年岁大了,但体力还行,还想再发挥点余热,那他该去干点什么?”法国人想一想,可能会说:“他可以去当市长。”什么?去当市长?没听错吧?法国人会很认真地对你说:“没听错,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在法国有许多高龄市长,70岁开外的很正常,80岁以外的也不稀罕。比方说,梅斯市的让玛丽·委什市长今年81岁;马尔提格斯市的保罗·隆巴尔市长82岁;弗孔杜卡罗市的阿瑟·利什利市长

我的心灵之屋

汪涵

超级女声把我从湖南本土推向了中国,我火了,获得了很多荣誉。2007年,主持完超级男声,我的身体开始不堪重负,外界传出了我得重肝病的消息:汪涵完了。

没那可怕,但的确比较严重,不尽快治疗就容易出事。当时转氨酶指数太高了,是正常人的10倍那么高,上7楼得休息两趟。主持节目时流鼻血,我赶紧用话筒的海绵把血吸掉,插播广告时,冲到台下,用冰块迅速止血,然后再冲到台上继续。

自从身体报警后,我放弃了很多工作和所有的兼职,现在正有机会把我的那些爱好放大,更投入地玩了。

我在长沙市中心有一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这套房子是我还没有什么知名度时置下的,地处商业区,周围很嘈杂,不太适合居住。现在,它的唯一使用目的是看电影。

后来,我就想到把这个60平方米的小空间搞成自己的私人影院,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这个小电影院是我自己一草一木搭建成的,中西结合,古色古香,所有的装饰品小玩意儿都是我从前古玩市场淘来的,今天淘回一个古董瓶子,可以养一些绿萝;明天淘回一只铜杯子;后天再来一只旧木箱,可以在我的电影室里当茶几;还有老头椅,磨得都发亮了,铺上靠垫,就是我的电影专座,很舒服。

屋里有一艘石船就非常过瘾,淘来了我,我吱吱吱吱上17楼,最后发现它太大了,做什么好呢?于是把它改造成了鱼缸,弄些流水,养几条小鱼,还挺有意思的。看电影时,戴上耳机,坐上逍遥椅,打开环绕声,流水叮咚,氛围特好。

深夜播完节目,很累,我会选一部周星驰的片子好好放松一下,笑一笑,就完了,周星驰真的是对生活很有理解的人,生活很难,不妨以轻松的态度对待,这就对了;下雪了,我窝在房子里放一部浪漫清冷的文艺片《日瓦戈医生》,大片荒野里的雪,我的窗外也是鹅毛大雪,还挺有诗意,心里能那么轻轻地动一下;哪个下午偷得半日闲,我看一部大片,跟随着别人的命运起伏,慢慢地让时间流走,窗外的阳光变得微弱,懒懒地透过窗帘照在我身上,楼下卖菜收摊的声音传来……有时,我还特别犒劳自己,比如准备一盘好吃的卤鸡翅,煮一碗黏糊的小粥,在深夜看电影时作为消夜,养心养胃。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这是我的专场电影,看着片,什么都忘了,汪涵是谁,只是一个认真享受一部电影的人,沉醉其中。有时候,人得有个空间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人得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躲人又何必尝不是呢?生活很难,人得有点小追求才活得下去,比如有的人天

天坚持散步,散步是一种追求。对我来说,一间看电影的小屋子,再来一壶清茶,日子就自得其乐了。

爱好多,也让我成为一个容易快乐的人。干什么都要学会快乐地干,何苦做得愁眉苦脸,跟自己过不去呢?就像我最开始做副厨时,还要负责暖场。我举左手,大家鼓掌;我举右手,大家笑;我举两个手,大家又鼓掌又笑,我那样儿肯定特滑稽,不然观众怎么这么配合呢?但大家看到我开心,我多有成就感啊!我还当过演员、摄像、导播,最后才当上主持人,跑龙套跑起来的,挺好玩的。

大概我看起来的确有幽默天赋吧,买东西说声“谢谢”,那人就笑了;我开门一叫妈,我妈就乐了,我想至于吗?别人为什么一看到我就开心呢?我特别有老人缘和小孩的缘。家里很小的孩子,爷爷奶奶说他每天吃饭要把汪涵的照片放在边上,睡觉也要把照片放在身边,说有这样一个人爸爸多好呀。为什么,因为我总是快乐的,而他们的爸爸妈妈老是板着脸。

说到将来,我希望有个女儿。很早前做节目,嘉宾是台湾的吴恩俊,在后台准备时,他的小女儿拿一个气球跑过来,“爸爸,我可不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当然可以啊”,她踮着脚亲了父亲一下,那一下好像亲在我心上,特别温暖特别幸福。如果我做节目时,我可爱的女儿在一边玩,那该多幸福。如果有几个儿子,就很麻烦,得要买通朋友编造故事,让他觉得爸爸了不起是个英雄。

摘自《深圳青年》

“我顽固地不爱他!”说完,张兆和气势汹汹地走了。

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他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回青岛后写信托二姐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很开明,主张儿女婚事由他们自理,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跑到邮局给沈从文打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电报,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这位“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摘自《人物周报》

十八是个木

白岩松

十八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把十八组成一个字,就成了木材的“木”字,当这个十八构成一个木字的时候,你就已经具有了可用之才的潜质。十八岁不是一个终点,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在我看来,成人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如果让我把所有的词汇转化成一个个词来概括成人的意义,我想就是责任这两个字。但是,它分成三个层面:

首先,从今天开始,你要承担起更多对自己的责任。如果说过去很多该你做的事情是别人要你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你要有更多的思考,要自己做。

高三的生活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进入高三之前,我在我们班排名是倒数,在那个时候想象考大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像我参加一场足球比赛,上半

场0:3落后,在下半场,我完成了逆转。我在高考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班的第八名,考到了北京广播学院。

那么,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不过就是在我进入高三之后,有了一次没有语言地和自己的对话,“我怎么办,我要做什么?”和自己对话之后,我列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我把把所有的书钉在一起,然后计算它总的页数是多少。算完之后,我计算了一下到高考那天还有多少天,接下来计算我要看完多少遍,那么就清楚地知道了每天我要看每个学科的页数。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严格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所以,可以看到那段时间我没有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每天认认真真完成计划,却在终点上有一个巨大的成功在等着我,这难道不是一种启示吗?

第二,你要承担对其他人的责

任。在过去的18年里,我们更多的是说“我,我,我”;今后你经常要关注的是“你”和“他”,这里面承担着其他人的责任。

最后,是成熟和成人。当你离开大学校园走向社会之后,还要面临那么多的平淡。生活就是平淡,你适应吗?有无数个挫折在等待你,你接受吗?

你可能会觉得将来很让人担心,会有一些恐惧,可是我又要告诉你,孤单、挫折、烦恼、平淡是成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成功的原材料。

人的一生非常像一场跳高比赛,最终你将以一次失败作为你成功的标志。你看,跳高的选手全是这样,跳过一个高度就要忘掉那个高度,马上就要再往上一厘米,接着去跳,哪怕他已经是冠军了,他依然要去尝试。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启示。一个最好的选手,就应该尽全力最后一跳,虽然这也许是我们再也跳不过去的高度了。

其实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

摘自《青年文摘》

巴菲特的处世宝典

总结出的赢得朋友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千万不要批评别人。

卡内基引用一句名言说:赠人玫瑰之手,犹有余香。要赢得朋友,最有效的办法是赞美别人,不是虚情假意的奉承谄媚,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赞美。因为人的内心最大的渴求就是“被人重视”。

巴菲特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只有八九岁,只是大概翻了翻,现在看来赢得朋友让别人喜欢你太重要了,他找到这本书再仔仔细细看一遍。

于是巴菲特跑到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卡内基在书中说:“我所说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在书中列出了非常系统的30条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其中,不要批评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其他还有:人人都希望受到注意和赞美,没有人希望被批评。在所有文字中,最好听的声音是自己的名字。处理争执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开

争执。如果发现自己错了,马上坦白认错。

问问题,而不要命令别人。帮助别人留下好名誉。

15岁的小巴菲特突然顿悟,这不正是我想要寻找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吗?我特别不擅长为人处世,掌握了卡内基这一套基本原则,我就能很好地与人相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让别人接受我喜欢我。但是,卡内基说的这些原则真的有效吗?

卡内基说:光是阅读这些原则没有用,你必须实践应用这些原则,因为我所说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试试。于是小巴菲特开始在各种场合试验卡内基的为人处世方法。有时他照着做,认真听别人说话,真诚赞美别人。有时他反着做,故意不听别人讲话,故意批评反对别人。事后他一次次对比分析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结果,最后发现卡内基所说的为人处世原则是对的,真的有用。

于是小巴菲特开始更多地实践应用卡内基提出的为人处世基本原则,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摘自《博客天下》